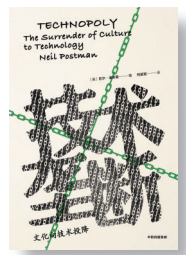




AI时代，来自1992年的警告

□汤凯燕



写这篇文章时，恰是李开复宣布筹组中文版ChatGPT公司之日。前几天，微软刚丢出一枚重型炸弹，将AI嵌入它的系统，全面提升生产力。AI2.0时代来临，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很多人分享了他们试用AI的经历。有位网友打算设计新款眼镜盒，他先与智能语言AI ChatGPT商量出设计方案，再复制粘贴，将方案丢给绘画AI Midjourney，立马生成几张成品设计图，他选择其中一张优化，最终得到满意结果。老板欢喜不已，联系工厂3D打印实物样品。这位网友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有梳理能力，不需要文字表达能力，不需要英文写作能力，不需要设计能力，我只需用5分钟时间让两个AI把活干了，而且这个结果可能比大部分专业的人干得更好，更快，而且成本更低。你说不可不怖？”

“可怕”二字道出了人们的隐忧。AI会编程，会写作，会翻译各国语言，会设计，会画画，会……在强大的计算机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被替代？“难道人以后就只有繁殖这个功能了吗？”有人这样评论。

早在1992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已经提出警告，他说：“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战争，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

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追溯技术与人类文化的消长，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此时技术是人类的帮手，协助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抵御自然威胁，使地球更适于人类生存。人类为主，技术为辅。

第二阶段为技术统治阶段。中世纪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是西方技术统治文化的起点。技术原本服务于某一目的，如城市建造地铁是为人们出行便利，但渐渐地，不仅人们出行习惯发生改变，商业圈开始围绕地铁形成，周边楼价大涨，城市的竞争力也相应提升。所以新技术影响的是整个生态环境。天文望远镜的发明使宗教神话迅速崩塌，印刷机令知识不再为极少数人垄断，思想启蒙。机械时钟的发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定量计时，人受时间的摆布。这时期人类崇拜科技，但传统文化还未被击破，只是被贬低。

第三阶段为技术垄断阶段。技术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呈现几何级增长，迅猛快速，一往无前。科学成为信仰，成为真理。人的判断被视为不可靠不稳妥的，因人类是情绪动物，有生理局限，人性弱点，需要靠计算机监管。计算机管理着所有的人类，一只只机器眼使人无处遁形。

人类技能越来越弱化，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成为消遣，GPS精确导航使方向感全无用处，计算能力在强大的数据面前一无是处，医学影像检查令医生的视触叩听等传统诊疗手段成为可有可无的技能。文字逻辑能力被图像视频冲刷，泛滥的信息混淆了人的思辨能力，只能为其摆布。

任何一种新科技的诞生都说是方便人类，然而人却越过越着急。

波兹曼呼吁人们重视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痛惜传统符号的丢失，他认为需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对抗科技垄断，用批判的角度来拷问技术发展。如果说从前的人还比较蒙昧，现在即使是普通人也意识到了科技日益逼近的威胁。在几乎无所不能的AI面前，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有人去向AI，它给出以下回答：

学习新技能和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技能和知识正在迅速涌现。了解这些技能和知识，并且持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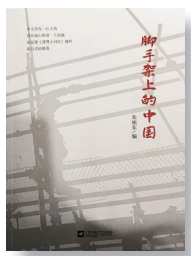
开发创造力：创造力是人工智能无法模拟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普通人可以在未来的职业中保持竞争力。

改变职业规划：某些职业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如果你的职业受到了影响，考虑转向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领域。例如，职业涉及艺术、心理学、人际交往等领域，人工智能还无法完全取代人。

掌握人机交互：普通人可以学习如何与人工智能交互，这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

保护个人隐私：由于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我们的个人数据越来越容易被采集和利用。普通人应该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自己的数据安全。

AI公文式的回答中已经包含了真相，那就是人不得不赛跑，不得不更换赛道，以免被不断进化的AI甩到时代边缘。然而人类又期待科学进步，那是人类的孩子，是人类制造的能够克服人类弱点的孩子。我们仰望着这个越来越优秀的孩子，既不安又骄傲。



回望铁军历程 蓄势再塑辉煌

——评《脚手架上的中国》

□徐仁祥

朱旭东，新华社高级记者，在2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为南通鼓与呼，留下很多精彩篇章：2006年，新华社发出他采写的《当无红包医院成为“另类”》，全国130多家主流媒体转载；2011年，《南通慈善双雄：一个磨刀的一个修车的》，让南通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两位基层老人的事迹风靡全国；2016年，《作别疆场还故乡 我们就是您的儿》，报道如老山参战幸存者32年如一日照顾牺牲战友父母的业绩，让无数读者潸然泪下。

“渐觉新闻作品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更为丰满的叙事方式，让思想更为自由的翱翔”，正是这一份理念、执着，和他对南通的深情、厚爱。近年来，朱旭东先后推出了几部描写南通人、记叙南通事的纪实作品。其中，《脚手架上的中国》，他深情地“将焦距对准了享有基建狂魔盛誉的中国建筑队伍，对准了这支队伍中的一个英雄群体——南通铁军：引领我们走近他们，发现他们，感受他们的承受与抗争，坚韧与爆发，建设与创造……”

这是一部南通建筑铁军的拼搏简史。与以往同一题材书籍的不同之处是：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路蓝缕、重大项目、主要荣誉的记叙上，而是以他20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锐利眼光，对南通建筑铁军拓荒成长的历史进行审视、思考、评判，对事件背后的人，人的观念，人的情感，人的决策等进行挖掘、分析、评说，对事件的成败得失进行探究、梳理、总结。这样的叙述，让我们不仅仅读到了建筑铁军风餐露宿的艰苦、争取项目的智慧、遭遇挫折的坚韧，还读到了他们因民工身份受到的歧视、因文化低下造成的无

奈、因背井离乡感受到的痛楚，等等。书中写到了“玻璃门”给民营企业竞标带来的困境、建筑企业互相担保带来的风险、“共撑一把大伞”得来的得失（乡镇建筑站外出接活打着“南通X建”招牌），等等。甚至还写到了罢工事件、工地事故、请客送礼，等等。生活本来就是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败走麦城”，“人前风光、人后内伤”。有时候，即使走过来了，也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只能靠自己去感悟。朱旭东以独到的视角、洗练的文笔，触摸了别人不敢写或者不愿写的诸多禁区话题。只有这样客观、真实的记载，才能称为信史，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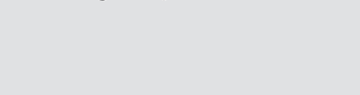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南通建筑铁军的家族群像。本书“没有一位主角，没有成心构建一个高潮，而是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散点式的群像”。作者采访了16位南通建筑业的领军人物和省建筑业协会的一位领导。他们和书中提到有名有姓的160多位建筑人物以及成千上万没有姓名的员工，共同构成了一幅南通建筑铁军的群像。与一般读到的口述史不同的是：这些口述者虽然都是行业翘楚，但并没有仅仅沉浸在辉煌的回忆中，而是对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进行认真地分析反思、总结提炼。他们袒露自己心声，他们介绍管理秘诀。他们自曝“内耗家丑”，他们评说同行经验，他们比较江浙优劣，他们瞻望行业前景，其一针见血，其坦率尖锐，简直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那些基于对人性深刻认识和设定的股权架构，那些基于对建筑工人需求充分了解而制定的规章制度，那些基于对合作

方牌牌判而拟定的谈判案例，简直可以当作企业管理的“葵花宝典”研习。这些文字能够见于书，当然与叙述者的坦诚、见识分不开，也与记录、整理者朱旭东的创作理念分不开。他不想粉饰繁杂的生活，他不愿“修饰”别人的记忆，他是一个诚心的倾听者，他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正如《半月谈》副总编张正宪所说：朱旭东的写作“总是在日常性的采写中关切人的发展，呼应人的精神，探求人的命运，总能在平民化的白描里写出自己的本真，写出独特的风格，写出跨界的底蕴”。从朱旭东笔下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群像，读者不难得出结论：南通建筑铁军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建筑行业脱颖而出，就是有一批能吃苦、肯担当、会思考的领军人物，以及这些人带出来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建筑行业有句话：“全国建筑业看江苏，江苏建筑业看南通”。至今，南通建筑企业已夺得122座鲁班奖，总数保持全国地级市之首。自20世纪80年代，建筑业始终是南通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近年来，受外部环境、房地产行业发展与自身因素等叠加影响，南通建筑企业与全国同行一样遭遇阶段性困难。2月3日，市政府召开全市建筑业发展大会，3月21日，市政府印发《关于促进南通市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在这样的形势下，读一读《脚手架上的中国》，向历史深处回望，向时代未来探寻，笔者相信，南通建筑铁军一定能蓄势再发，走出低谷，再创新南通建筑业黄金时代。

（《脚手架上的中国》由南通报业图书出版中心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书架



《声回响转》 葛兆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第四部分，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剑桥的陌生人》 刘禾 三联书店

刘禾用一种实验性的写作（融写实、虚构、历史于一个文体），把她追踪和研究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奈斯特”的人物原型的过程呈现出来，背后的大关怀是20世纪上半叶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到剑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为人知的诸多面向、相互关联和价值选择，尤其是“剑桥帮”的左翼科学家团体。



《屠龙简史：武林漫游三千年》 王永胜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武侠小说中的武艺和真实武林中的不同，前者天马行空，后者追求实践。作者从习武经历出发，结合史料记载，理清真实武林与江湖想象之间的区别与勾连，梳理出似真似幻的武林脉络。同时，通过武艺，与自我、与历史对话，从这个有趣的切片中，去“窥探”历史、武学中被人忽略的诸多秘密。



《追求幸福》 刘宗坤 山西人民出版社

《独立宣言》将“追求幸福”与“生命”和“自由”并列，明确其为人人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本书从美国内战时期起，遴选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法院判例，在故事讲述中生动回顾了普通人如何借助司法，挣脱被社会强加的多样枷锁，在种族、婚恋、教育、普选、堕胎等方面逐步获得平权与自由。

再谈美食家的素养

□展颜

读了《唐鲁孙谈吃》。彼时我总结的美食家的素养有五点：第一会吃，对好餐馆了如指掌。第二，懂得吃的搭配，比如吃涮锅子，要配上一碟卤鸡冻。第三懂吃的掌故，每件美食，都能说出名人掌故。第四，能说出菜好的道理。第五，能使用丰富而新鲜的形容词来形容味道。

不同的美食家，拥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喜好。世界之缤纷精彩，在于各各不同。读完唐鲁孙的美食文，觉得可以成为美食家再添几条必备的素养，或说是成为优秀美食家必备之要素。

一、要馋。唐鲁孙说自己从小就嘴馋，长大更甚。在没有什么可食时，就读食谱望梅止渴。有时兴起，就比葫芦画瓢，自己下厨做几味菜。每到一处新地方，就喜欢东南西北到处觅食。

二、逛菜市。唐鲁孙每到一处，特别喜

欢逛菜市。他说逛菜市不仅可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而且在菜市旁边有当地的道地小吃可吃。去北京时，遛遛东黎明即起，独自去菜市，把北京的小吃早点炒肝、杂碎、豆腐脑、江米粥、油炸鬼……都一一品尝了。去天津时，他也去逛菜市，吃到了天津独有的小吃嘎巴菜，俗称锅巴菜。

三、保留菜单。唐鲁孙旅游时有个习惯，不论是别人请客，还是自己吃饭，都要把菜单留存起来，回家贴在剪贴簿上。他在上海去德兴馆吃过五次，次次都把菜单贴起来。在德兴馆里，他先后吃过红烧鳊鱼、炒蟹黄油、笋腌鲜、油爆虾、草头圈子、虾子大乌参、糟钵头……正因为保留了菜单，他在写《去来德兴馆》时，才显得游刃有余。有些文章并非吃完饭立刻就写，保留菜单就是保留记忆的一个好习惯，翻阅菜单能帮助回忆曾吃的菜名，捡几道来细写，就方便多了。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面镜子

——《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出版

□武晓兵



近日，《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郑克晟（1931—2022），祖籍福建长乐，出身书香世家，祖父郑叔忱（1863—1905）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父亲郑天挺（1899—1981）为享誉国际的历史学家。本书对郑氏家族有所谈及，书前附“郑天挺家族谱系图”“梁、陆、张、郑、董五家亲属关系图”，可以帮助我们对其家世有一些直观的认识。本书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过庭之训”；第二部分“师友风义”；第三部分“朝花夕拾”；第四部分“拾零谈片”。主要围绕郑天挺、郑克晟及其在北大、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等不同时期交往的朋友圈展开叙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京津地区高校不得不避战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追随南迁的学人像郑天挺、梅贻琦、傅斯年、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雷海宗、向达、邵循正等在艰苦抗战中不仅持续深耕学术，也偶有闲情苦中作乐。尤其教授当中的单身，他们常常一起奉行AA制聚餐谈天，关系非常融洽。有次餐后，有人提议预测抗战何时能胜利，大家都踊跃参与，众说纷纭。有人戏说他来生生日可胜，有人猜测来年某节日可胜，大多数人则推断1944年前可胜，而唯独邵循正认为1945年10月10日即可胜。郑天挺将他们提供的时间都记在了日记里。后来的事实大概印证了邵循正的独具眼光。这是他们在西南联大时期日常生活中的一角，更是知识分子渴望胜利的拳拳爱国之心的溢于言表。

抗战胜利后，学人北归。1946年7月，胡适执掌北大校长。在北大复校重新规划的忙碌中，也有些值得记录的日常。9月，罗常培女儿结婚，胡适担任证婚人。在这次场合上，郑克晟第一次见到胡适。胡适给他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描述说他

“着长衫……长得潇洒，学者风度，没架子”，是“北大的漂亮的校长”。相比胡适，傅斯年当时则“又胖又黑”，“块头就有胡适两个”。还比较随意地身着“一件全是大褶子的浅色西服”，遭到在场的教授太太们哄笑。郑克晟最后一次见到胡适是在1948年8月9日北大26位教授为郑天挺五十周岁祝寿的时候。不久，随着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胡适在国民党政府的几度催促下，“毫无准备的走了”。面对权势变革，郑天挺并未离开北大，而是极力维持，被称为“北大舵手”。

1949年后，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因为考证了杨贵妃的入宫始末，常被挑出来诟病为“目前尚有人在研究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云云。已经奉调南迁的郑天挺几次听到后，颇觉诧异，在日记里说“近来学者每举寅恪老考证杨太真入宫是否处女为史学界之病态，颇多异议，具有诋毁之意”。他从谢国桢处借来这本书“穷一夜之力毕之”，读完后认为并非如传言一般，整章18页约万余字中谈及贵妃入宫事只占3页约千余字，而且旁及他事。郑天挺以为“不应举此为病”，认为陈寅恪此书“考证社会生活及工业技术尤精”，“不应抹煞其工力”。

郑克晟195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对师辈授课的不同风格曾有描绘。例如，他说非常喜欢听张政烺的先秦史课。张为人谦和、随性，又博闻强识，上课往往先与学生闲谈，海阔天空。上课没有正式讲稿，只有一些小卡片，虽然有人说比较凌乱，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真实想法。张政烺的讲课风格或许有西南联大时期的影子。何兆武曾经回忆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就说“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

他真正的思想”。不过，1952年北大迁至城外，教材、观点也逐渐统一甚至变得教条，张政烺授课也很少再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郑克晟也谈及其他师辈的不同讲课风格，如余逊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有详细的讲稿，笔体端正，慢而清晰，对初学历史者很有帮助。又说杨翼骥口才极佳，讲课精彩，且板书工整，郑天挺评价他是“北大正派风气”。

学术的春天再次来临时，为追赶失去的时间和促进学科的发展，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出外访问，积极与海外学界交流，并组织相关学术活动。1980年8月，郑天挺主持的南开大学明清史国际研讨会召开，出席中外学者120余人，盛况空前。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史学界举办的首次大规模国际性学术会议。不过，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状况和学术生态，学界在举办国际会议时邀请海外学者、经费控制、接待住宿等事宜均缺乏经验，所以不得不向有经验者请教。旅美华裔学者何炳棣就曾为郑天挺出谋划策，尽心尽力。海外华裔学者不仅在筹备会议方面提供大量经验，并且在沟通中外、两岸文化交流也起到重要桥梁作用。1985年12月，郑克晟出席香港大学举办的国际明清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大陆学者25位、台湾学者18位受邀出席。这是海峡两岸明清史学界时隔三十多年之后的首次境外学术交流。时任港大的华裔学者赵令扬教授在居间联络两岸和促成这次会议方面就贡献非常之多。

书中像这样的学林掌故、文人趣事相当之多。文笔洗练，娓娓道来，妙趣横生，是透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面镜子，相信读者自会有体味。

